

乡村振兴背景下扶贫小额信贷减贫效应研究

张 慧, 刘胜题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根据收集的 400 份问卷的数据建立 PSM-DID 模型来探究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有一定的减贫效应,并且得出家庭人均年收入与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与家庭人口数成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关键词:扶贫小额信贷;乡村振兴战略;PSM-DID 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2)01-0211-06

扶贫小额信贷^①不仅改变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而且推动了金融扶贫的进程。国务院扶贫办^②在 2014 年 12 月出台《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提出激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内生动力,推动财政扶贫政策与金融良性互动,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作用。

金融扶贫重在“造血”^[1]。扶贫小额信贷是引导中国从被动脱贫向主动脱贫转变的重要方法,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其成了扶贫工作小组的研究重点,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该政策展开了研究,但是对于其减贫效应尚且存在争议。

一些研究认为小额信贷能提高贫困户的收入,即具有一定的减贫效应。胡宗义和罗柳丹^[2]基于 2003—2011 年中国 26 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其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何军和唐文浩^[3]通过对江苏省涟水县的实地调查结果实证分析后提出小额信贷对贫困农户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aity 和 Sarania^[4]提出小额信贷能增加参与者的收入;程娅和李善民^[5]利用中国首个信用县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小额信贷的增收效应,其研究表明小额信贷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激励效应。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不明显。李明贤和刘美伶^[6]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得出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的年纯收入无显著影响;章贵军、罗良清和奚晓军^[7]针对中国 40 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调查数据,其研究发现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对贫困户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效果的因果关系并不稳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③强调政府应加强政策扶持,建立帮扶长效机制,培养农民的乡村振兴能力。在此背景下,对隶属湖南省衡阳市的两个县即衡南县和衡阳县重点扶持村的脱贫户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并根据收集的 400 份问卷的数据建立 PSM-DID 模型来探究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是否具有减贫效应。

1 乡村振兴战略与扶贫新挑战

金融扶贫在引导中国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则是将两者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8]。

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任务后,“三农”工作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收稿日期:2021-09-24

作者简介:张慧(1998—),女,湖南衡南人,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刘胜题(1967—),男,湖南益阳人,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含 WTO)、国际银团贷款法、金融法与经济法。

注:①据《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解读》,扶贫小额信贷是专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5 万元以下、3 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的发展资金。

②现已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

③2021 年 4 月 2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包括 10 章,共 74 条。

在湖南麻阳模式下，银行机构、政府部门以及村委会三者建立的信用评级小组以及政府部门的1 000 万扶贫专项资金简化了贷款流程，降低了坏账率，同时投资途径也得以拓宽，加入以村集体的形式投资如光伏发电项目和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投资如海田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在投资期间，政府部门实行了全方位的指导，同时进行绩效考核，优化了贫困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流程。

2.3 河北隆化^①模式

河北省隆化模式即为典型的“五位一体”扶贫模式，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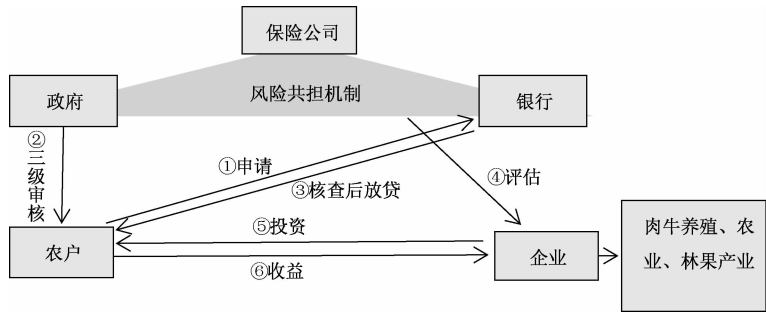


图 3 河北隆化模式

在河北隆化模式下，政府、银行以及保险公司按照 1:1:8 的风险分摊比例建立的风险共担机制适当分散了财政压力，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

2.4 3 种扶贫模式对比分析

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全面脱贫前，中国的扶贫模式不断完善。湖南麻阳模式通过建立扶贫专项资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扶贫模式下“贷款难”的问题，投资范围的拓宽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而河北隆化模式则通过引入保险公司建立风险共担机制进一步缓解了财政压力。目前看来，在现存的扶贫模式中，河北隆化模式对于该政策的持续实施更为适用。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湖南省衡南县和衡阳县近年来也在不断摸索扶贫新模式，其扶贫模式类似于湖南省麻阳模式，扶贫资金主要投资于个人的种养殖业和合作社项目。下文将从实证研究的方面来探索该模式下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对于脱贫户脱贫前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影响，即研究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是否有减贫效应。

3 小额信贷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选择与研究方法

为了能够有效避免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使处理组和对照组更好地满足共同趋势假设。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来改善样本选择偏差，根据倾向得分值采用 k 近邻匹配核匹配等方法对处理组和对照组

进行匹配，剔除有显著差异的样本。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即本文使用的 PSM-DID 模型。

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法即 PSM-DID 模型是研究政策实施效果的常见方法且被广泛运用，付洋^[9]基于 PSM-DID 模型提出高速公路养护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且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要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郑彩玲、张继彤^[10]基于 PSM-DID 模型提出高铁开通可以加快创新要素流动、优化创新环境，进而促进城市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

本文主要借鉴付洋的基于 PSM-DID 方法的高速公路养护投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建立 PSM-DID 模型，主要从贫困户家庭人均年收入探究该政策的减贫效应。

本文的 DID 方法的假设模型设定为

$$Y_{it} = \beta_0 + \alpha_1 T_dB + \theta X_{it} + \epsilon_{it} \tag{1}$$

式中： Y 反映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对于贫困户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影响； X_{it} 为一组可观测的影响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控制变量，即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影响贫困户进行信贷的变量； β_0 为常数项； ϵ_{it} 表示残差。

为消除样本选取的偏差，基于 PSM-DID 方法进行稳健性评估，主要步骤为：①利用 PSM 找到与处理组特征最为相似的对照组；②对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 DID 回归。具体回归模型为

$$Y_{it}^{PSM} = \beta_0 + \alpha_1 T_dB + \theta X_{it} + \epsilon_{it} \tag{2}$$

注：①河北隆化县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部，地处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属国家级贫困县和河北省深度贫困县。

3.2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选取。评价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推出对于贫困户收入的影响,主要选择贫困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变化进行计量分析,因为这一变量隐含了家庭规模的影响。

2)核心解释变量选取。本次问卷调查中影响贫困户收入的变量主要是贫困户是否办理扶贫小

额信贷业务。

3)控制变量选取。控制变量是指除是否办理扶贫小额信贷业务这一核心变量之外,其他可能对贫困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如贫困户户主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主要变量统计描述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处理组			对照组			全样本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家庭人均年收入	400	2 030.79	1 114.5	400	1 553.46	876.03	800	1 792	1 029.80
户主年龄	400	3.525	1.114 67	400	3.76	1.206 67	800	3.643	1.166 8
户主受教育程度	400	2.245	1.066 69	400	1.41	0.743 83	800	1.828	1.009 5
家庭人口数	400	3.995	0.978 45	400	4.09	1.031 78	800	4.043	1.006 0

注:1. 户主年龄各个数字表示如下:1 表示年龄 18 岁以下;2 表示年龄在 18~25 岁;3 表示年龄在 26~30 岁;4 表示年龄在 31~40 岁;5 表示年龄在 41~50 岁;6 表示年龄在 51~60 岁;7 表示年龄在 60 岁以上。2. 户主受教育程度各个数字表示如下:1 表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2 表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3 表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4 表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5 表示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

3.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通过实地发放问卷,分别从湖南省衡南县和衡阳县重点扶持村随机抽取了 200 个脱贫家庭,共获得调查样本 400 个,调查题项包括家庭人口、基本特征、收入等基本信息。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3.4.1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分析时,匹配变量的选择尤为重要。本文主要选取户主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作为匹配变量。

表 2 回归结果显示贫困户家庭人口数这个匹配变量均在 95%置信区间下显著,表明样本确实存在选择性偏误。因此,在双重差分之前需要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表 2 基于 logit 模型的贫困户信贷概率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值	95%置信区间
户主年龄	0.080 559 1	0.069 777 8	1.15	-0.056 2,0.217 3
户主受教育程度	1.022 7	0.096 861 2	10.56	0.832 9,1.212 5
家庭人口数	0.007 493 2	0.078 162 3	0.10	-0.145 7,0.160 7

3.4.2 匹配结果平衡性检验

采用 k 近邻匹配($k=1$)对具有相同倾向得分值的样本进行匹配,随后对匹配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其关键在于观察各控制变量的误差削减情况,

具体结果见表 3。从表 3 可以发现,匹配后全部变量的标准偏误均在 5%以内,且 t 检验的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对照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

表 3 匹配结果平衡性检验

协变量		均值		标准偏误/%	误差削减/%	t 检验	
		处理组	对照组			t	P
户主年龄	匹配前	3.535	3.76	-20.2	—	-2.86	0.004
	匹配后	3.563 2	3.542 1	1.8	91.0	0.26	0.792
户主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	2.245	1.41	90.8	—	12.84	0.000
	匹配后	2.147 4	2.147 4	-0.0	100.0	-0.00	1.00
家庭人口数	匹配前	3.995	4.09	-9.4	—	-1.34	0.182
	匹配后	3.968 4	4.005 3	-3.7	61.2	-0.56	0.578

3.4.3 双重差分结果分析

根据匹配结果,剔除了未匹配成果的数据,对

匹配成功的数据进行双重差分。

表 4 列出了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前后家庭人均年

收入的组内均值差和组间均值差。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比对照组高 253.568 元;提出后处理组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比对照组高 407.595 元,则 DID 估计值为 154.027。政策实施前后两者收入均有增长,但是处理组较对照组增长较快,由此可以说明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能够增加脱贫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即有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一定的减贫效应。

表 4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前后家庭人均年收入的组内均值差和组间均值差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对照组	处理组	均值差
政策前	1 021.037	1 274.605	253.568
政策后	2 371.296	2 778.891	407.595
均值差	1 350.259	1 504.286	154.027

3.4.4 双重差分结果显著性检验

模型估计结果(表 5)表明,DID 估计值比较显著,家庭人均年收入与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家庭人口数呈反相关关系,且影响比较明显。

在控制变量中发现,家庭人均年收入与被调查贫困户户主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有正相关关系,与家庭人口数有负相关关系。

表 5 引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模型估计结果
DID 估计值	α_1	1 157.001
户主年龄	θ_1	136.296 7
户主受教育程度	θ_2	306.95
家庭人口数	θ_3	-111.582 9
C	β_0	919.917
$F(4,755)$	—	82.99
$\text{Prob}>F$	—	0.000 0
R^2	—	0.305 4

4 结论与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强调培养农民的乡村振兴能力,因此提高脱贫户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能力,引导脱贫户自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尤为重要。绝对贫困被消除的背景下,引导脱贫地区主动巩固其脱贫成果极其重要,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减贫效应的验证对于政策的继续实施有着重要意义。

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①处理组的脱贫户脱贫前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比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后增加了 154.027 元,即该政策有一定的减贫效应;②在分析影响变量中,家庭人均年收入与被调查脱贫户户

主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有正相关关系,与家庭人口数有负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政策宣传,引导主动发展产业。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存在部分脱贫户不了解该政策的现象,政府部门应该定期开展政策宣传活动,引导脱贫户自主发展产业。

2)创新扶持模式,完善风险控制机制^[11]。本文研究的两个县城基本符合湖南省麻阳模式,其风险控制还有待加强,可以借鉴河北省隆化模式引入保险公司等机构完善风险控制机制来适当分散坏账损失的风险,减少财政压力,同时加强对申请者贷款资格的审核,降低坏账率。

3)加大补贴力度,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补贴不足的问题在调研过程中反应较为突出,政府部门在对贫困户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估时应该加大对优良企业的补贴,鼓励申请者进行投资;同时对合作银行进行激励,鼓励银行机构增加对申请者的贷款,优化其贷款流程。

4)加强持续性跟踪,提供专业指导。市场波动对于脱贫户的投资影响较大,政府部门应该定期评估脱贫户的投资项目,为其生产经营提供专业指导,并派专人进行回访调查,为其排忧解难。

5)细化管理,合理利用资源。针对不同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的脱贫户应该细化管理,不同年龄阶段的脱贫户对于投资的选择有所差异,政府部门应该针对其年龄特征提供合理的参考意见;其次脱贫户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政策效应影响十分显著,政府部门可以适当为贫困户提供教育机会,以少数带动多数,极大化利用其年龄及教育优势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以及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其收入。

参考文献

[1] 植凤寅.金融扶贫重在“造血”[J].中国金融,2014(3):90-93.

[2] 胡宗义,罗柳丹.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37(3):10-15.

[3] 何军,唐文浩.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扶贫绩效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11):169-172.

[4] MAITY S,SARANIA R.Does microfinance alleviat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Studying self-help groups in Bodoland, Assam [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2017,27(7):1016-1019.

[5] 程娅,李善民.小额信贷与农户收入增长关系研究:基于PSM模型的经验证据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

(6):121-124.

[6] 李明贤,刘美伶. 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J]. 农村经济,2020(6):49-56.

[7] 章贵军,罗良清,奚晓军. 中国扶贫小额信贷减贫增收效果评价[J]. 统计学报,2020(2):57-71.

[8] 范应胜. 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探索与实践[J]. 时代金融,2021(7):56-58.

[9] 付洋. 基于 PSM-DID 方法的高速公路养护投资对企业生

产效率的影响分析[J]. 项目管理技术,2021,19(3): 57-63.

[10] 郑彩玲,张继彤. 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 PSM-DID 模型的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2021,40(2): 28-35.

[11] 周孟亮,袁玲玲. “后脱贫时代”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范研究[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5): 88-100.

Research on the Aid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icrofi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Hui, LIU Shengti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400 questionnaires, establishes PSM-DID model to explore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icrofinance polic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microfinance policy has a certain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of the famil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family population.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micro credi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SM-DID model